

王绩隐逸赋的个性特征与承传意义

刘伟生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以《游北山赋》为代表的隐逸赋既描写了王绩个人的隐逸生活,也深隐着他一生的思索与矛盾复杂的生命意识。他遵奉老庄的自然价值生命观,但儒家的济世情怀与伦理价值生命观在他那里也根深蒂固。他既有通达的死亡态度又不乏对游仙的隐约向往。王绩赋文中这些矛盾心绪既有时代风云的影响,也有地域文化的浸染;既源于家学的熏陶与培育,更关乎个人的经历与秉赋。对应于三仕三隐的人生历程,王绩的赋风也经历着由细密富丽到淡朴疏野的渐变。无论从赋篇语言与结构的过渡,还是从隐逸思想与题材的承转来看,王绩在赋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承传意义。

[关键词]王绩;隐逸赋;《游北山赋》;生命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2)05-0084-07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Heritage Significance of Wangji's Privacy - fu

LIU Weis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Wang Ji's Privacy - fu, represented by *You Beishan Fu*, not only describes his hermit life, but also contains the deep life thoughts and complicated life consciousness in all his life. Though he obeyed Zhuangzi's natural value view of life, the Confucian's kindhearted feelings and ethics value view of life had great influence on him. He not only had open - minded attitude toward death, but also longed for the private and comfortable life of hermits. These contradictory feelings in Wangji's Fu not only come from the influence of times situation and regional culture, but also from the nurture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his own experiences and characters. Since Wangji had been officials and then secluded for three times in his life, the style of his Fu also changed gradually from details and magnificence to simplicity and thrifty. Both the transition of language and structure and the heritage of hermit ideas and themes show that Wangji's Fu has important heritage significance in the Fu history.

Key words: Wangji; Privacy - fu; *You Beishan Fu*; life consciousness

王绩传世赋作四篇:《三日赋》(并序)、《游北山赋》(并序)、《燕赋》、《元正赋》。据《王无功文集》及序,另有《登龙门忆禹赋》、《河渚赋》、《独居赋》、《孤松赋》、《酒赋》等佚赋。在初唐赋坛,相对

于太宗君臣的庙堂之音而言,王绩的隐逸赋别具风韵,但他在赋史上的地位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1]139-144}本文拟对王绩赋的个性特征与承传意义进行分析。

收稿日期: 2012-08-06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辞赋通史》(08AZW001)

作者简介: 刘伟生(1970-),男,湖南涟源人,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辞赋及先唐文学研究与教学。

最能反映王绩思想意识与艺术水准的是作于贞观十五年(641)的《游北山赋》。围绕居游北山的隐逸之乐,赋从隐逸之志、山林之游、兄长之悼三大方面铺展开来。

从“天道悠悠,人生若浮”到“请息交而自逸,聊习静而为娱”,为第一部分,写的是对世事多变的感慨,也算是对自己最终走上隐逸道路的原委所作的阐发。赋云:

天道悠悠,人生若浮。古来贤圣,皆成去留。八眉四乳,龙颜凤头。殷忧一世,零落千秋。暂时南面,相将北游。玉殿金舆之大业,郊天祀地之洪休。荣深责重,乐不供愁。何况数十年之将相,五百里之公侯。^{[2]1316}(下引《游北山赋》、《三日赋》、《燕赋》皆据《全唐文》。)

“尧眉八采”(《论衡·骨相》)、“文王四乳”《淮南子·修务训》,与“龙颜凤头”一样,系指帝王之福相。这里要说的是这些南面称帝、富贵非凡的王侯将相,也不免殷忧一世,并终归于死,何况芸芸众生。作者由此感慨:“已矣哉!世事自此而可见,又何为乎惘惘?弃卜筮而不占,余将纵心而长往。任物孤游,遗情直上。……请息交而自逸,聊习静而为娱。”这正是赋篇的中心本旨所在。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到“松花柏叶之醇酎,凤翮龙唇之素琴”为止,集中笔力描写北山风物。说是集中,其实也不是一时一次的景色与游览。有初入林区的奇诡与艰险:

连峰叠起,复嶂环纡。历丹危而寻绝径,攀翠险而覓修涂。……自谓抟风飙而出埃壘,邈若朝元宫而谒紫都。

有对灵踪仙迹的论议与描绘:

洞裊窥书,岩边对局。仿佛灵踪,依稀仙躅。……喜方外之浩荡,叹人间之窘束。……纷吾人之狭见,搅群疑而自拂。……指期系影,依方捕风。谁能离世?何处逃空?

一番时空交错、虚实相杂之后,才进入“有我之境”:

咸遂性而同乐,岂违方而别守?余亦无求,斯焉独游。属天下之无事,遇山中之可留。卿将度

日,忽已经秋。菊花两岸,松声一丘。不能役心而守道,故将委运而乘流。……阅丘壑之新趣,纵江湖之旧心。道集吾室,风吹我襟。松花柏叶之醇酎,凤翮龙唇之素琴。

在云峰霞壁之间,浮雾漠漠,流水潺潺,两岸菊花,一丘松声,叶动猿来,花惊鸟去。主人公于兰窗茵阁里饮酒抚琴,享受山间的清风明月,没有世俗的喧闹,没有名利的羁绊,好不自在与舒适!这一段描写,真得陶渊明《归去来辞》之神韵:“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3]391}纯用白描,同样的清幽淡雅;如出天籁,同样的畅达醇和。

“白牛溪里,峰峦四峙。信兹山之奥域,昔吾兄之所止”。以下是第三部分。由对其兄文中子王通当年隐居北山、聚徒讲学的追述与悼念再度转入对自己隐逸生活的描绘与发抒。

王通(584-618)是隋末大儒,守道不仕,隐居北山,著书讲学,有《中说》存世,卒后门人溢为文中子。“察俗删诗,依经正史。……山似尼丘,泉疑洙泗”,是说王通著书讲学的功绩与影响,俨然以孔子相比。“忽焉四散,于今二纪。地犹如昨,人多已矣。念昔日之良游,忆当时之君子。……姚仲由之正色,薛庄周之言理。”接下来提到王门弟子,并以仲由比之姚义,以庄周方之薛收。“触石横肱,逢流洗耳。取乐经籍,忘怀忧喜。时挟策而驱羊,或投竿而钓鲤。”又回笔勾画出王通博学而自适的形象。枕石漱流,驱羊钓鲤,忘怀忧喜,逍遥自在,是儒道一统的王通,也是王绩化的王通。但一面是自适的称许,一面却是不遇的感伤:“讲堂犹在,碑石宛然。……昔文中之僻处,谅遭时之丧乱。……惜矣吾兄,遭时不平。……眷眷长想,悠悠我情。俎豆衣冠之旧地,金石丝竹之余声。没而不朽,知何所营。……怅矣怀抱,悠哉川域。……子敬先亡,公明早卒。”再往下转,又是自己隐逸之志的抒发:“与沮溺而同趣,共夷齐而隐身。……乐山泽之浮游,笑江潭之枯槁。戒非佞佛,斋非媚道。无誉无功,形骸自空。坐成老圃,居然下农。身与世而相弃,赏随山而不穷。”

二

这就是《游北山赋》的大体内容,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叙述、描写与议论里,深隐着王绩一生的思索与矛盾复杂的生命意识。

陆淳《删东皋子后序》云:“余每览其集,想见其人,恨不同时,得为忘形之友,故去彼有为之词,全其悬解之志。”^{[4]222}“悬解”语出《庄子·养生主》,说是“安时而顺处,哀乐不能入”的达观状态。在王绩的诗文中“有为之词”和“悬解之志”是同时并存的。

他遵奉老庄的自然价值生命观,认为无功无用可以保身全生。在自然里,“竹生大夏溪,苍苍富奇质。……刀斧俄见寻,根株坐相失。裁为十二管,吹作雄雌律。有用虽自伤,无心复招疾。不如山上草,离离保终吉。”(《古意六首》其二)^{[5]480}(下引王绩诗皆出于此)。“奇质”的翠竹因有用而遭砍伐,反不如无名的小草可保“终吉”。在社会里,“位大招讥嫌,禄极生祸殃”(《赠梁公》),“明不若昧,进不若退”,否则就会“本缘未丧,命为才绝”(《灵龟》)。这种全身远祸的思想发展到极端,便是对知识的批判,对儒学的鄙薄。在《负苓者传》里,他把伏羲画卦看成兆乱之始:“使天下之智者、诡道进出,……于是智者不知,而太朴散矣。”^{[2]1327}在《游北山赋》里,他不满儒学的烦琐:“《礼》费日于千仪,《易》劳心于万象。审机事之不息,知浇源之浸长”。所以他自己“不闲拜揖,兼糠粃礼义,锱铢功名”(《答冯子华处士书》)。^{[2]1322}

但儒家的济世情怀与伦理价值生命观在他那里也根深蒂固。他“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晚年叙志示翟处士正师》),十多岁开始就干谒长安,希企有用。他对身为儒学大师的三兄王通尊崇备至,在《游北山赋》的自注里,直称他为“王孔子”,同时又感叹他“遭时不平”:“吾兄仲淹,以大业十三年卒于乡馆,时年三十三,门人谥为文中子,及皇家受命,门人多至公辅,而文中之道不行于时。余因游此溪,周览古迹,盖伤高贤之不遇也”。在伤兄长之不遇中,其实也隐含着自己有志无时、仕途失意的耿耿心绪。即便在临终定论的《自撰墓志铭》里,他对于自己一生仕途堰塞、无功无闻也难于

挂怀:“起家以禄位,历数职而进一阶。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于是退归,以酒德游于乡里。”^{[2]1326}明乎此,我们才能理解他反复于仕隐之间的举动,才能读懂他赋文中的不怨之怨。

除了用与不用的纠结,王绩生命观的矛盾还体现在对待生死的态度上。

在王绩那里,既有通达的死亡态度,又不乏对游仙的隐约向往。在他的诗文中,反复表达着对时间与生命的迁逝之感:“自觉生如寄,方知世若浮。”(《泛船河上》);“浮生知几日,无状逐空名。”(《独酌》);“自悲生世促,无暇待桑田。”(《过山观寻苏道士不见题壁四首》);“夫人生一世,忽同过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答冯子华处士书》)。

因为对人生的短促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对死亡便有着通达的态度:“不能役心以守道,故将委运而乘流”(《游北山赋》),生死是自然之运数,死亡无法避免,不如委运任化、顺应自然。但同样也因为体认到了人生的短促,他抑止不住自己的苦闷与落寞。看看《游北山赋》中的游仙心态,我们就能感受到他的这种思绪。

天道悠悠,人生若浮。……昔怪燕昭与汉武,今识图仙之有由。人谁不愿?直是难求。……不得轻飞如石燕,终是徒劳乘土牛。已矣哉!世事自此而可见,又何为而惘惘?弃卜筮而不占,余将纵心而长往。

虽说神仙世界“直是难求”,自己也将“弃卜筮而不占”,但这终究是“人谁不愿”的事情,而且在第二部分北山之游的描写里,“上元仙骨”、“太清神手”、“南箕”、“北斗”、“偃佺”、“麻姑”、“青龙”、“元牛”、“真客”、“仙经”、“赤城”、“元圃”、“八洞之金室”、“三清之玉宫”等种种神仙情事也占了相当的篇幅。其中甚至包含服食求饵的痕迹:“拭丹炉而调石髓,裛翠釜而出金精”,“既采药而为食,谅随情而不矫”。在《答冯子华处士书》里,更明确说:“黄精、白术、枸杞、薯蕷,朝夕采掇,以供服饵。”可见死亡不必轻就,长生值得留念。

这种人注定是孤独而苦闷的。“余亦无求,斯焉独游”(《游北山赋》),他独游、独饮,独自调适着自己的心绪:“足下欲使吾适人之适,而吾欲自适其

适。”(《答程道士书》)^{[2]1323}以期自得其乐,但那份孤独与落寞总是真实地存在于他内心的深处:“寂寞坐山家”(《山家夏日九首》其一)、“无人堪作伴”(《题黄颊山壁》)。

正如霍松林先生所言:王绩“愈表现得超脱、旷达,愈显出其无法超脱的分裂状态,也愈见其内心的焦灼与痛苦,也愈见其生存的孤独,在他那追求自适和任诞的外表所掩盖的内心世界里,有着压抑不住的不平、忧愁、孤独和苦闷”。^{[6]65}

三

王绩赋文中这些矛盾心绪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其中既有时代风云的影响,也有地域文化的浸染,既源于家学的熏陶与培育,更关乎个人的经历与秉赋。

王绩生当隋唐之际,在隋朝由盛而衰的落差间、隋唐易代更迭的涂炭里,唐初官场倾轧的残酷中,种种混杂多变的人生世象都警示着生命的短促与脆弱。“伊昔遭丧乱,历数当闰余。豺狼塞衢路,桑梓成丘墟。余及尔皆亡,东西各异居”(《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中年逢丧乱,非复昔追求”(《晚年叙志示翟处士正师》),强烈的生命危机感时时耸恿着王绩保持全身远祸的心绪与处境。

可是生存环境的恶化迫使王绩更为关注生命本体的同时,王绩济世的家学背景乃至河汾致用的地域文化精神又让他不能忘怀个体的社会价值。据吕才《王无功文集序》记载:王绩“历宋、魏,迄于周、隋,六代冠冕,皆历国子博士,终于卿牧守宰,国史、家谍详焉。……君祖安康献公,周建德中,从武帝征邺,为前驱大总管,时诸将既胜,并虏获珍物,献公丝毫不顾,车载图书而已,故家富坟籍,学者多依焉。”^{[4]1}这是一个“六代冠冕”、“家富坟籍”,世重儒学的家庭,王绩的三兄王通则不仅是王氏家学的集大成者,也是隋代首屈一指的大儒。因为王通的著书讲学,北魏以来就兴儒重教,沿袭汉儒经世致用精神的河汾文化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出身于这样的地域与家庭,王绩自幼熟读儒家典籍,日后与走上仕途的王通门人也不无交往(《游北山赋》自注云王通:“门人弟子相趋成市”,“门人多

至公辅”)。这些都激发着他跻身台辅、直取卿相的政治抱负。

儒道原本是相通的,由汉末至魏晋的学术大势便是儒道的相通相融。山东士子也并非专攻儒家经学,而是以儒术为主,兼综百家。王绩早年的读书也是“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晚年叙志示翟处士正师》)。《游北山赋》云:“但水月之非真,譬声色之无佛。过矣刘向,吁磋葛洪。指期影,依方捕风。谁能离世,何处逃空?”儒、道、佛三教都可通融。当然,在王绩那里三教也都有不足:“觉老释之言繁,恨文宣之技痒。”(《游北山赋》)这种多元思想的杂糅正好成为王绩的生命思想在复杂之中始终蕴含着深刻矛盾的原因之一。

其实处世态度的选择更关乎个人心性与经历。

王绩在其诗文中对自己的性格多有表述:“走意疏体放,性有由然”(《答刺史杜之松书》)^{[2]1320},“吾受性潦倒,不经世务。屏居独处,则萧然自得;接对宾客,则忤然思寝”(《答程道士书》)、“家兄知吾纵恣散诞,不闲拜揖,兼糠粃礼义,锱铢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务”(《答冯子华处士书》)、“先生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五斗先生传》),^{[2]1338}“有唐逸人,太原王绩。若顽若愚,似矫似激”(《自撰墓志铭》)等等。

这种由疏懒迂阔的天性与文化上的优越感所造成的简傲放达的风度,使王绩在北朝至唐初尊崇儒家、讲究礼度而又不乏尔虞我诈的社会风尚里成为不合时宜的局外人。

拥有这种才华与心性的人往往少年得志,老来凄凉。王绩十五岁干谒宰相杨素与文士薛道衡等,便赢得了“神仙童子”、“今之庾信”的美誉。但自信满满的 he 初入仕途仅得六合县丞,且以耽酒废事被劾还乡。第二次荐征待诏门下八年,也终于忍不住托疾归隐。第三次出仕,竟然效仿阮籍故事,因太乐署史焦革家善酿,而求为大乐丞。这样的经历反过来激发了他疏阔的本性,使他的处世态度和文学风格与时流正脉越来越远。

心境影响及于艺术。明代何良俊说:“当武德之初,犹有陈、隋遗习,而无功能尽洗铅华,独存体质。且嗜酒诞放,脱落世事,故于情性最近。今观其诗,近而不浅,质而不俗,殊有魏晋之风。”^{[7]225}郑

振铎也认为王绩“不曾做过什么‘文学侍从之臣’故也不必写什么‘侍宴’、‘颂圣’的东西,以损及他的风格,或舍己以从人。”^{[8]282}诗文如此,赋亦如此。《游北山赋》思绪纵横,语言质朴,于山水田园赏心悦目之景,闲静悠远之趣尤多会心。体现了王绩“题歌赋诗,以会意为功,不必与夫悠悠闲人相唱和也”(《答冯子华处士书》)的创作观念,迥异于初唐以来君臣唱和、应制奉答、宴会赋咏之作。

四

横向但静止的观照还不足以阐明王绩在隐逸思想及赋作艺术史上的地位。就王绩而言,自身性格与文化影响的多元多变更容易促成他赋作的自我更新与历史承传。

对应于三仕三隐的人生历程,王绩的赋风也经历着“由细密富丽到淡朴疏野的渐变”。^{[9]81}

早年的《三日赋》和《登龙门忆禹赋》词藻华丽,形容尽致,音韵流畅,与庾信的文风相似。(《登龙门忆禹赋》已佚,但从薛道衡“今之庾信”的赞誉及同时创作的《三日赋》庶几可以推断出它的大体风貌。)这自然与他少年得志的处境相关。

中期的《燕赋》不再是轻松的流利之词,而是托物言志,在“昔年居屋,桂栋兰芬;今来旧地,谷变陵分”的今昔对比中,在“若非历阳随水没,定是吴宫遭火焚”的质疑里,感慨“光阴递代,摇落悲哉”的人事沧桑,寄寓人生无奈的失意悲愁,巧妙地表达出全身避害的思绪。赋风也由清丽而略转沉郁。“文变染乎世情”(《文心雕龙·时序》),是初仕的挫折、王朝的更替与隐居的体验促成了王绩赋风的转变。同期稍后的《答冯子华处士书》、《答程道士书》更可佐证王绩此时的心志与文风。两文虽以表达“适心为乐,雅会吾心”、“各宁其分”、“顺适无阂”的栖逸之志为本旨,但也不时流露出“乱极则治,王途渐亨”,“贤人充期,农夫满于野”的挂怀与向往,并以薛收早亡,举荐无人以及“吾家三兄”的导引,闪烁而又巧妙地道出了才能济世的自信与希企有用的隐衷。艺术上也直承魏晋通脱文风,大量运用杂言,表现出不同于齐梁浮艳气息的疏淡风格。

晚期除《游北山赋》外,王绩还写过一篇《元正

赋》。赋篇从元正节日的解读开始,内容多习见风俗,造语则平和淡朴,作者自己似乎成了现世生活的旁观者。他的梦境全存于美好的回忆里:“遥忆二京风光好,玉城正殿年光早。……但愿皇家四海平,每岁常朝万方客。”连对未来的祈愿也挂靠于对往昔盛况的描写之后。回到现实,他又免不了感伤喟叹:“别有故园人,独守寒乡春。……老夫无所欲,光阴苦难足。试看蜚燕何日还,坐望归鸿已相续。莫愁来岁晚,但恨前途促。年年岁岁有元正,何年何岁罢逢迎。聊献雀而相贺,且吞鸡而自营。”^{[10]150、151}可见怅恨与怨望依然存在,只是相对而言有所疏淡。最能体现王绩疏淡朴野风格的当然还是如前所述的《游北山赋》。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每次变革,都伴随着对陶渊明式隐逸心境会通的加深与承前启后、由丽而朴赋风的演进。

五

至于王绩在文学史上的承传意义,论者多有美誉。元人辛文房称其:“高情胜气,独步当时。”^{[11]14}明代何良俊谓其:“尽洗铅华,独存体质。”^{[7]225}清人翁方纲说:“王无功以真率疏浅之风格,入初唐诸家中,如莺凤群飞,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清)翁方纲撰:《石洲诗话》卷一)^{[12]1733}明代黄汝亨《东皋子集序》云:“东皋子……澹远真素,绝类陶征君。”^{[4](P224)}清人贺裳在《载酒园诗话又编》中又说“诗之乱头粗服而好者,千载一渊明耳。乐天效之,便伤俚浅,惟王无功差得其仿佛。陶、王之称,余尝欲以东皋代辋川,辋川诚佳,太秀,多以绮思,掩其朴取,东皋潇洒落穆,不衫不履。”^{[12]296}凡此种种,都比较集中地指向王绩心性的高标与诗文的疏朴,并盛称其承传之功。但这种总体的评说也容易失之笼统,其间还不乏夸大之词。我们不妨从赋篇语言与结构的过度、隐逸思想与题材的承传来具体阐述王绩在文学史上的承传意义。

大体而言,南北文学不仅有着地域的区别,还存在着时代的落差。南朝由汉魏的质朴自然而渐转为精美工丽,其间的过程绵绵不绝。北朝则在对峙之后直承汉魏古朴之风,所以在文学发展上比南朝差了一个时代。这种因时代的落差而造成的区别体现在题材上是北朝辞赋偏重宏大与崇高,而南

朝则日益琐屑与世俗。表现在形制结构上,北朝辞赋也多类汉魏规整长篇,如张渊《观象赋》、李騫《释情赋》、李谐《述身赋》、阳固《演赜赋》之类,与南朝辞赋篇幅的小品化和表现的灵活性迥然有别。语言风貌上则存在流丽与质朴之别。

王绩是南北与隋唐的勾连者。他的《游北山赋》与《三日赋》都是千字以上的有序大赋。《游北山赋》更是2400多字的长篇。长篇中不乏陶渊明式的真切生动与散淡悠远,但也不免成辞的运用与概念的阐释,尤其结尾一段,感觉就象象谢灵运山水诗的玄言尾巴,而整篇赋的体制也有点象谢灵运的三段式杂糅结构,不及《归去来辞》的纯净专一、简洁明快。《三日赋》在语言风格上则更多地保持着南朝的流丽华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五、七言诗句入赋的问题。五、七言诗与赋的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实质性的转变是从南齐开始的,梁陈时期五、七言诗体赋得以成熟,庾信《对烛赋》《春赋》、徐陵《鸳鸯赋》、萧悫《春赋》等,都可以当作代表。王绩的《三日赋》《元正赋》乃至朱桃槿的《茅茨赋》正是上承梁陈,下启王勃《春思赋》《荡子从军赋》的过渡性作品。如《三日赋》,开篇即以七言歌行入赋:“年去年来已复春,三月三日倚河湄”,几句四言之后,又是婉转流丽的七言:“潘尼已向天渊渚,袁绍应过薄洛津。旧嫌晦日年芳早,情知上已风光好。谁家园里泛红花,何处堤傍无绿草。翠幕临流灞池曲,朱帷曜野横桥道。”中间还有一些类似律诗的五言句子:“树下遗香粉,砂头送纸钱。寻春须得遍,但任莫言旋”。

便是文学主张,在王绩身上也可看出南北的双重影响。除了上文提到的“题歌赋诗,以会意为功”(《答冯子华处士书》)以外,在《游北山赋序》里,王绩还说:“诗者志之所之,赋者诗之流也。”这种“志”、“意”的并重其实也是对汉魏六朝文学主张的综会。在《游北山赋》的末段里,王绩不经意中还用了“赋成鼓吹,诗如弹丸”八个字,这八个字也与南朝文论有关。前四字出自于《世说新语·文学》:“孙兴公云:《三都》、《二京》,五经鼓吹。”后四个字用的是谢朓关于诗歌主张的名言:“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昙首传附王筠传》)

这些都可看出王绩赋作在艺术上的过渡性。

就社会层面而言,隐士是游离于官场的士人,它不是个别的生存状态而是普泛的历史现象。代有隐士,隐逸的行为取决于个人心性,也与社会状况关系密切。从三国到两晋南北朝,士大夫普遍树立了希企隐逸的愿望,而且由被动变为自觉,由外迹于山而转为内足于怀。这与社会的动乱与玄风的炽盛不无关系。汉末之乱,三国鼎立,司马代曹,八王之乱,永嘉南渡,“五胡乱华”,南北分裂,莫不成为士大夫希企避世,以隐存身的动力。

玄学标榜老庄,老庄哲学本身就是隐士的哲学,隐逸而有玄学思想为基础,则隐逸本身就是高尚而又合乎自然本性的内在需求,不再需要其他外在的缘由。即使身在朝市,也不妨碍心神的超然无累,于是有了朝隐、通隐之说。这又涉及到隐逸的种类。隐逸的分类,标准不一,结论纷纭。其中有一种影响较大的说法,就是“大隐”、“中隐”、“小隐”之说。身在庙堂而心在山林的朝隐被称为“大隐”,真正的隐士反被称为“小隐”,地位不高或居于闲职者便自比为“中隐”。大隐、中隐、小隐三种提法并非同时并生,汉代以前无所谓大小,六朝大隐之说兴起,本来意义上的隐逸反成为小隐。晋人王康琚《反招隐诗》说:“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13]310}中隐之说定型于中唐。白居易《中隐》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14]490}中隐其实就是“吏隐”,“吏隐”的传统十分悠久,从东方朔到阮籍、山涛,到东晋的风流名士,再到唐代的王维,我们看到了各种吏隐的面目。吏隐的根本在于调和士大夫的独立要求与集权制度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形态与深浅处决于士人心性与政治环境的松紧及思想文化的发展。东晋儒道的兼综融合与名士的世家身份,让仕隐的转化相对自由,无须在名义上与思想意识上刻意强化仕隐之间的对立状况与大隐小隐的分明界线。中唐专制的日益盛行和士大夫的莫测命运则又迫使他们重新思量大隐小隐之间的可能区域。白居易外迁洛阳、分司东都的生活体验与禅宗的新鲜血液无疑给了他寻找折衷之路的启示。其实陶渊明和王绩的时官时隐作为时流的另类与隐逸的中坚,与中隐或直称“吏隐”与“官隐”本不乏进化的因由

与理路。当卢藏用以隐求官时,其终南捷径便成了纠狂过正的客观动力。从陶渊明到白居易,隐逸方式在改变,隐逸的原始精神也在衰减,其间起决定作用的是隐者的操守与资本。

隐者的资本,称为“山资”或者“隐业”。隐业的来源,或继承祖业,或时官时隐,或接受馈赠,或躬耕田亩,或授徒讲学,或因凭技艺。陶渊明是需要躬耕陇亩的,谢灵运则可以因凭祖业。王绩的隐居条件也不错,他在《游北山赋序》中自叙家世时说:“吾周人也,本家于祁,永嘉之际,扈从江左,地实儒素,人多高烈。穆公感建元之耻,归于洛阳;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则晋阳之开国,终乃安康之受田。坟陇寓居,脩焉五叶;桑榆成荫,俄将百年。绩南山故情,老而弥笃;东陂馀业,悠哉自宁。酒瓮多于步兵,黍田广于彭泽。皇甫谧之心事,陇亩终焉;仲长统之规模,园林幸足。”王维的辋川别业在中国园林史、文化史上都极富盛名。白居易的中隐生活也是非常惬意的,他的《中隐》诗说:“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东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

严格说来,隐者的操守与隐业的丰厚是成反比的。王绩的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便逊色于阮籍与陶渊明。反映在文章上,便少了批判的力量与理想的光芒。好在火种不灭,文学也不等于道学,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接续了陶渊明、王绩的隐逸之风与山水之文,并得到了李、杜的推重。在这个传承的过程中,王绩以个人的深刻体察与对隐者的频繁称引凸现了隐逸的主题,并融合了山水与田园。

韩国学者白承锡在《初唐山林隐逸赋之研究》一文中谈到:王绩的《游北山赋》是“继承陶渊明《归去来辞》的神韵之作,并开了初唐山林隐逸赋之先河”。^[15]可以用来评价王绩在隐逸赋史上的承传

意义。

参考文献:

- [1] 刘伟生. 唐赋研究三十年述评(1978~2008)[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 [2] 董浩. 全唐文:卷一三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 龚斌. 陶渊明集校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4] 韩理洲. 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5] 彭定求. 全唐诗:增订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6] 霍松林,梁静. 试论王绩诗文的独特意蕴[J]. 山西大学学报,2006(3).
- [7] 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8] 郑振铎.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 [9] 韩晖. 隋及初盛唐赋风研究[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10] 张锡厚. 敦煌赋汇[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 [11] 傅璇琮. 唐才子传校笺[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2] 郭绍虞. 清诗话续编:第三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13] 梁萧统. 唐李善注·文选:卷二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4] 顾学颉. 白居易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15] 白承锡. 初唐山林隐逸赋之研究[J]. 滁州师专学报,2000(4).
- [16] 刘伟生. 赋体叙事研究前景展望[J]. 云梦学刊,2011,32(5).
- [17] 刘伟生. 李峤《楚望赋》并序的理论内涵与价值[J]. 中国韵文学刊,2011(3).

责任编辑:李珂